

创业导向

的文化根植

基于温州与关中两地的实证分析

缪仁炳 著

Chuangye Daoxiang de  
Wenhua Genzhi

上海三联书店

11  
创 业 导 向

序

文化机构

数字图书馆与其中的网络资源建设

第二版 序

China University of  
Library Studies

中国图书馆学

创业导向

的文化根植

基于温州与关中两地的实证分析

缪仁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业导向的文化根植/缪仁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0  
ISBN 7-5426-2369-9

I. 创... II. 缪... III. 企业文化—研究—中国 IV. 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5593 号

**创业导向的文化根植**  
——基于温州与关中两地的实证分析

---

**著 者 / 缪仁炳**

**责任编辑 / 钱震华**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责任制作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9.75**

---

ISBN 7-5426-2369-9/F·464

定价: 22.00 元



## 作者简介

**缪仁炳**,1971年5月出生,浙江省苍南县人。2001年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原杭州商学院),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4获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管理。曾在《统计研究》、《科学学研究》、《改革》、《浙江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获浙江省教育厅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一项,主持省部级课题一项,参与完成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六项,企业应用课题六项。

本著作作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商研究中心成果。

并得到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00033511)、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0017)、

浙江省教育厅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的资助。

## 自序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若对这些成果一一加以整理,一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描述与互动机理研究,例如对温州经济、苏南经济以及长三角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区域互动的研究,对块状经济、经济集群及集群机制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将区域创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并不深究创业本身对区域经济的贡献以及创业的动因;其二是将区域经济的研究触角向区域创业及其动因等领域延伸,在研究中引入区域创业资源、非正式制度或文化等因素,在这一类研究中,经济发展与创业资源被看作是不可分割、密切关联的,创业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

然而,对区域经济、创业资源及其动因的研究迄今为止并不令人满意,甚至于陷入困境,因为被认为创业资源丰富的区域,创业活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而很多创业活动的活跃区域创业资源禀赋并不丰富,甚至还相当短缺。值得庆幸的是,对创业中的“制度先发优势”研究取得了较多满意的成果,这使得制度经济学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分析区域经济的“敲门砖”,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对正式制度的研究时不时的会跨越“正式”的分界点,踩到“非正式制度”的领地中去,踩到社

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领地中去,例如一些研究在分析区域创业的正式制度因素时,不得不触及文化因素,因为创业的“热情”总是表现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又长,长了又割”的现象,这很难在正式制度的研究结果中得到满意的解释;再例如一些研究对创业中自发性产权制度安排进行分析时,也不得不触及文化因素,因为创业企业的多元化产权组合并非都是正式制度框架下的决策行为,而带有深刻的区域文化特色……这种研究不胜枚举。

然而,仅此而已!尽管部分研究开始转而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学分析模式与惯性思维的影响,这种研究在方法上多少表现出些许“羞涩”,对区域经济、创业活动的文化因素分析一般是触及即止,后续深化研究看似就要“破茧而出”,却不见有说服力的结果。家族企业的研究似乎就是这一领域“后续”深化研究的代表,大量的研究文献集中在家族企业的存在、必然、困境、治理、超越、传承等各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一般关注的是“创业界点”之后的对象,大量文献着墨于家族企业的成长,而家族创业的成因是什么仍然悬而未决。这一研究不足反过来影响了对家族企业成长的有效分析,实际上并没有找到家族创业的根源。

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与经济学的某些交叉研究看,很多学者从社会网络、家族(氏族)关系、“单位制度”等角度描述了文化因素在乡村、乡镇经济中的纽带作用。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的一系列研究很大程度上触及到创业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将文化与乡村经济发展直接联系,避开文化因素与经济发 展的中间过程——创业心理与行为的分析。因此,很难满意地回答诸如以下问题:

人们为什么要进行创业?

某些区域的创业活动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模式？

这种创业模式的根本文化力量是什么？

是否能有说服力地证明文化与创业之间的确切关系？

不同创业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怎么样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

.....

对这些问题回答的不尽如人意影响到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例如合理选择区域创业模式的依据是什么？创业、二次创业与区域产业升级该考虑怎么样的区域文化基础？对创业的文化根植问题研究的不足，使得研究结果的解释性往往大于可应用性，表层、孤立的解释多于深层、相互联系的分析。

## 二

深入探讨创业的文化根植是有意义的，但是困难是显然的。

德国学者何梦笔先生(Carsten Herrmann - Pillath)认为：经济发展是同社会及更广泛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要对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作出深刻分析与判断就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要想进行这样的研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显而易见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以前没有人按这套思路来做这类研究，我们必须追求超越。”

本研究在一开始就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关键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切入点研究这一问题，采用哪种有说服力的方法可以证明创业活动的背后确实存在具体的文化力量，而且，这种证明不仅停留在逻辑猜测层面。

首先对文化进行认识与界定是有难度的。文化与区域文化的表象相当繁杂，能够被看作“文化”的现象千丝万缕，需要加以

洞察与剖析。对文化进行分层研究是将繁杂的文化线索结构化的一种方法,正如特龙彭纳斯和汉普登·特纳(Aifons Trompenaars & Hampden - Turner)在其《在文化的波涛中冲浪——理解管理中的文化多样性》一书中所描述的,文化的外层——物质层,表现为语言、食物、建筑、纪念碑、神殿等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而我们又能感知到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出诸如人们的心理、行为与习惯,规范与价值,这是文化的制度层(主要指非正式制度);但在深究人们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时,我们又可以感受到“一种特定的组织文化或职能文化不过是某些群体若干年来在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形成的自组织方式”,“形成了不同的逻辑假设体系”,这是文化的核心,即文化的假设层。

因此,文化是基于一定核心假设的规范与价值,表现为群体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但是对文化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有概括力的、清晰的、广为认同的、结构化的体系。因而在以往的诸多研究中,研究文化的特定表现多于研究文化的抽象概念,例如价值体系的比较等内容,更难以进行文化的抽象概念与特定表现的联系分析,因而难以有效揭示文化与经济或管理变量之间关联机制。

其次对创业精神进行认识与界定也有一定难度。若深入分析创业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发现,创业精神也包含有多个层面,从表象上看,创业精神的差异表现为创业活动的差异,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参与创业活动的积极性是不同的,但是创业活动千差万别,很难以活动的差异来界定创业精神的不同;从心理、行为习惯层面看,创业精神表现为人们对创业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规则等,这一层面具有抽象性质,如何进行清晰地、结构化地界定创业精神,还需深入研究。

从以上分析看,对文化与创业精神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层次的选择,要慎重考虑选择何种层面进行研究才能取得较好的研究结果。文化人类学、文化传播学,甚至历史学、宗教学都选择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研究层面进行研究。文化传播学仅在文化的表象层进行研究,大多分析流行文化的表现、动向与变迁,难以进行文化的抽象研究;文化人类学则更多地对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挖掘,并通过表层文化的种种表现来揭示这种“深层结构”,但是不同研究的描述语言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于受文化自身的影响,同样的语言描述所揭示的“深性结构”也存在差异,如中国的“道”与日本的“道”,中国的“忠”与日本的“忠”均存在很多差异;历史学、宗教学更多是文化的具象,或者说其本身就在文化的范畴之中,难以脱离文化,从“第三者”的角度来审视文化。

这些学科的研究对本书研究层次的选择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本书的研究需要。本书需要在普遍意义上界定不同区域的文化与创业精神,建立不同区域、层次的文化、创业精神的一般性框架。

### 三

在心理与行为习惯层面提取文化与创业精神的抽象维度,建立文化与创业研究的一般体系框架是本书研究的立足点。

要在这一立足点上进行研究,首要应解决的是文化与创业精神差异的普遍性基础。1952年,文化人类学者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lm)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普遍性类目(Universal Categories),从而使不同文化有一个一般性的框架进行研究。Inkeles 和 Leevinson 在 1969 年也曾提出过所谓的“标准

分析的问题”(Standard Analytic Issue)来研究文化。这些看法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与方向。

跨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霍夫斯特德(Geert Hofstede)在1980年曾说过:“多学科方法的结合研究是必须的”,因为“在文化研究的层次中,个体、群体、组织甚至社会整体都可能是相互关联的”。在他的研究中,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将“文化分维度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战略”引入到文化的研究中,这是霍夫斯特德解决文化研究困境的关键方法创新。这一方法实质上是将心理学中“等级量表”方法引入文化研究,从而较好地形成了“文化分维度”研究,解决了对多种文化建立“一般框架”工具性问题。这一研究也使得文化的研究由解释层面向应用层面迈进了一大步,尤其对管理应用层面的研究进展很大,大量地应用于文化与管理问题的研究。

本书继承霍夫斯特德的传统,在研究方法和文化维度设计方面借用了他的成功方法。这一方法在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中可能已不是一种创新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文化研究领域,这一方法的引入还不到30年,尤其在中国,迄今为止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中仍占主导地位,鲜有此类研究。因此,文化研究的应用性,尤其是文化研究在管理与经济中的应用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正是立足于“文化分维度”测量研究,本书解决了创业的文化根植性研究中的第一个方法难点。

“文化分维度”研究对认识与界定创业精神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为创业精神与文化研究的难点具有类似性。创业精神的认识与界定的难点表现在:创业活动具有多样性,所以我们很难在创业活动层面对创业精神进行很好的研究,同时“创业精神”一词所表达的内涵至深而不明,以至于找不到明确的外延边

界进行研究。

本书受 Lumpkin & Dess 等人研究的启发,采用“创业导向”一词来界定创业精神。1996 年 Lumpkin & Dess 在管理研究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中提出“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一词,从创业者心理与创业行为相结合的角度对创业精神进行界定,实际上与文化的研究相类似,将心理学中“等级量表”方法引入创业精神的测量与比较研究中,从而解决了本书研究的第二个方法难点。

在本书文稿的交流过程中,曾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方法的可行性提出过怀疑。因为心理学“等级量表”的测量大多集中在微观、个体层面,而文化的研究,涉及个体、群体,甚至于国家层面的研究,属于中观或宏观的研究层面,有限的几个文化维度能否概括全部的文化内涵?对此有所怀疑不足为怪,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文化等级量表产生的过程,多少可以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顾虑。

例如,在霍夫斯特德四维度文化的出台过程中,1966—1967 年他曾通过开放式问卷搜集到 183 个有关文化的问题,涉及到了 53 个国家 60000 多份问卷。他运用斯皮尔曼发明的因素分析方法,对量表的问题构成进行提炼,量表的问题逐步浓缩到 160 个,60 个……到 1974 年,这一调查涉及到了 66 个国家,18 种语言,在不同时段的分析过程中,量表不断得以改进,直到 1994 年,量表的问题浓缩到了 20 个最为有效的问题(VSM94),归结为四个文化维度。因此,若将文化整体看作一个向量空间,文化的维度就是一个向量基,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向量空间,文化维度是高度概括的抽象了的文化。

本书的研究借用了霍夫斯特德、特龙彭纳斯、Rotter、Jackson、郑伯壖等人的研究量表成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中国化问题的研究。

## 四

本书在方法定位的基础上,以文化区划而不是行政区划作为地区的选择标准,选择中国的两个创业活跃区——温州地区和关中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可能很多人对温州地区的创业活动都会略知一二,而对于关中地区的了解则可能少得多。多年以来,由于受到新闻报道导向的影响,受到对成功创业者尊崇心理的影响,很多人对温州地区文化与创业活动、创业精神甚至文化底蕴有深刻印象。但是本书作为一项以直接经验式(Empirical Research)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多少会令这些人有点失望,尽管这种失望情绪并不多,但还是有的,甚至可能还有些许争议。

怎样看待温州人,而不是关中人,是这种失望情结的关键所在。作者从初稿完成后至今的三年多时间里,对这一问题不无思考。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一种人、一个群体、一种文化的了解可能有四个信息来源:一是媒体的报道;二是交往过程;三是亲身经历;四是建立在这三者之上的学术研究。媒体尽管以真实性作为职业自律的原则,但多少有一些渲染的成分,在学术研究的领地里,这是一扇窗,是引发学术研究的兴趣之窗,但它并不是研究本身;人们的交往过程确实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但是缺乏系统性,缺乏深究表象背后的内涵,缺乏深究现在状态既往历程,在学术研究的领地里,这是一个偶然的案例,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亲身的经历似乎可以克服前面两者的不足,但是作为生长于斯、成长于斯的个体而言,情感性因素往往是很难避免的,正如尚会鹏先生所说的,“科学研究必须排除情绪化的因素,不管这种因素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因此亲历也

会受到情感的干扰,只有秉持科学研究的信念才可能使结果更具有真实的价值。

本书的作者是温州人,从小在温州生活了16年,对温州人、温州人的生活与文化有着外人难以体会的经历,耳闻目睹了温州人的艰难困苦、卓越奋斗的悲喜历程,对温州充满了回忆与乡情,所幸的是写作本书时,作者已离开温州近20年了,旁观的时间超过了亲历的时间,这使作者具备亲历者与旁观者双重的身份来研究温州文化与创业精神,相信这会对本书研究的真实性产生积极性影响,同时作者研究过程中也着力追求与现实相符、与历史相符的客观性原则。

尽管如此,对本书某些结论的争议不可避免,例如在本书的交流过程中,就有学者对温州人的较弱创新性提出怀疑。对于这一问题,必须明确两点分析基础,首先必须认识温州人的创业基础,也就是要认识温州人的创业导向是以创新为基础,还是以其他创业导向为基础;其次创新性强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温州人创新性的认识还必须建立在对关中人创新性的比较认识基础上。明确这两点以后,再来考察本书数据分析及其过程的可靠性,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所幸的是本书研究的数据经过验证具有较好的可靠性,本书所得出的多步骤结论之间也基本具备了逻辑上的一致性。

## 五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框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共七章。

本书第一部分是全书认识视角的铺垫,由第一章构成。

在第一章导论中,阐述了本书研究创业导向文化根植的理论视角,界定了本书研究的文化与创业导向的属性,明确了本书

研究文化理论渊源、研究区域及其选择依据,交代了本书研究的材料构成与本书研究铺陈的逻辑安排。本章是全书的研究基础,意在研究视角上统驭全文,建立后续分析的逻辑架构。

本书第二部分是研究主体部分,由第二章到第六章共五章组成,包含区域创业特点、文化传统、文化维度、创业导向的比较研究,创业导向文化根植的具体关系研究等,最终形成本书的主要结论。

本书的第二章从温州、关中两地创业特点出发,分析了两地在哲学思想、工商业传统、重商意识与家族(泛家族)文化三方面的区域差异,将创业活动的特点融入当地文化传统进行分析。在这部分研究中,对两地特性的认识多于共性的比较,意在两地抽象文化维度与创业导向研究奠定现实基础。

本书的第三章基于跨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了本书研究的主要文化维度框架,提出温州、关中两地文化维度差异的影响因素与理论假设。同时,以理论分析为基础,结合大规模问卷调查分析,验证了区域文化差异的理论假设,分析了文化传统与文化维度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以两地区域社会文化为界定标准,分析了温州的相对封闭性与关中的相对开放性,得出了区域文化差异的主要结论。

本书的第四章基于创业理论的各种研究框架,总结前人研究中的创业导向维度,形成本书研究的创业导向维度框架与组合创业导向的结构。通过理论分析提出温州、关中两地区域创业导向理论差异假设,同时结合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两地创业导向的基本特点,形成两地区域创业导向差异的主要结论。

本书第五章根据横向比较研究与纵向逻辑研究相统一的原则,研究本书的主题——创业导向的文化根植问题。本章区域

文化差异与创业导向差异比较研究为基础,提出创业导向文化根植的具体关系假设,进而通过大规模调研数据实证研究,揭示创业导向文化根植性的具体关系,形成了从文化到创业导向的逻辑路线,得出本书研究的最终结论。

本书第六章是总结性一章,总结本书第二部分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温州文化中创业导向的特点,关中文化中创业导向的特点,讨论了文化与制度均衡的相关问题、本书研究的不足与后续拓展研究方向。

本书第三部分是本书主体研究的扩展,由第七章组成。在这一章中,主要就浙商创业的文化基础、其他区域(杭州与南宁周边地区)的工作价值观、文化对跨区域创业投资决策权等主题进行了论述与调查研究,旨在对创业导向的文化根植问题应用于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也是总结性地交代笔者多年来在这一主题研究中的相关研究积累。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限于作者学识水平与研究条件,疏漏与谬误不可避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缪仁炳

2006年7月于杭州